

河姆渡文化新论

——海峡两岸河姆渡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管敏义
王幕民



兩岸河姆渡文化
研討會論文集
河姆渡文化學術
會論文集
海峽兩岸河
姆渡文化學術
論文集
海峽兩岸河
姆渡文化學術
研討會
文化學術研討會
集海峽兩岸河
姆渡文化學術
研討會論
海峽兩岸河姆
渡文化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岸河姆渡文化
研討會論文集
岸河姆渡文化
研討會論文集
岸河姆渡文化
研討會論文集



海峽出版社

河姆渡文化新论

——海峡两岸河姆渡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王慕民 编
管敏义

海洋出版社

2002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姆渡文化新论：海峡两岸河姆渡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王慕民主编. - 北京：海洋出版社, 2002

ISBN 7-5027-5501-2

I. 河… II. 王… III. 新石器时代文化-文化遗址-余姚县-学术会议-文集 IV. K878.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1699 号

责任编辑：陈莎莎

责任印制：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北京海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000 册

定价：25.00 元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一

毛昭晰

1999年10月15日至17日,来自祖国海峡两岸各地的54位学者相聚在宁波,参加了河姆渡文化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认识了不少学术界的新朋友,也见到了许多老朋友,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我50年前在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求学时的同窗石兴邦、吴汝祚两位学长也从遥远的西安和北京赶来,更是使我欣喜不已。

70年代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至今已有20多年了,20多年中,我们曾开过几次学术讨论会,但与会者都是祖国大陆各地的学者。而此次研讨会会有14位台湾学者,还有3位香港学者参加,可以说这是海峡两岸学者相聚在一起共同讨论中国史前文化的第一次盛会。在会上,大家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河姆渡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对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及遗址中发现的器物 and 遗迹进行分析和论述;二是对河姆渡文化和其他文化包括台湾和太平洋史前文化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和探讨。文章的涉及面有大有小,大的讨论到百越文化、海洋文化;小的只讲一件陶器、一个耳饰,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篇论文都很有意义。关于第一类问题,首先是河姆渡文化的分期和变迁问题。过去,根据河姆渡遗址的四个地层,大家都认为河姆渡文化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在这次研讨会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海明先生分析了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各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陶器的类型排比,认为河姆渡遗址所含的文化遗存不能代表河姆渡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他将四

期说加以充实修订,提出了“四期八段论”,并认为将河姆渡文化分为“四期八段”其发展的脉络更为清晰,年代也更为精确,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新见解。徐建春先生从地理学的角度提出河姆渡地区曾发生过海侵海退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其文化内涵、特征及兴衰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余姚市文化局的邵九华先生则认为把河姆渡文化消亡的原因归之于海侵和火灾的观点要作商榷,他认为河姆渡遗址曾经经历过两次特大洪灾,并认为这是河姆渡文化消亡的原因。李小红先生也就地理环境在河姆渡文化兴衰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一向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这些年由于长江中游和淮河流域史前稻作遗存的发现,学术界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李晨、王象坤两位先生根据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炭化稻及稻作农具,认为我国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比河姆渡提早 2000 年,从地理位置来说,从长江流域向北推移了五个半纬度,达到了淮河流域。南京大学张之恒教授从河姆渡出土的丰富的稻作遗存分析,认为河姆渡文化稻作农业已经进入史前农业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即锄耕农业阶段。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从河南贾湖遗址和其他遗址人骨的聚类分析,结合少数民族语言的资料,探讨了河姆渡人的族源和稻作农业起源的关系,提出长江下游为中国稻作起源地之一。中山大学曾骥教授从饮食文化的角度提出河姆渡人创造的饮食习俗是江南水乡“饭稻羹鱼”的来源。

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大量植物遗存,浙江省博物馆的俞为洁研究员和浙江大学的徐耀良教授对此做了综合性的研究。在对植物种属进行科学鉴定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植物和人类社会的关系。

关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工具,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好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把重点放在石器上,特别是石镞。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林士民研究员认为河姆渡是石镞发源地,河姆渡出土的石镞从形制上说,经历了隆背型、弧背型、斜脊型和台阶型的四个阶段,他指出石镞是制造木器的工具而不是农业生产的工具。张之恒教授则认为

不同形制、不同时期的石镞有不同用途,长方形的石镞可能是用来翻地的,刀耕火耨时代,先用石镞砍伐树木,所以不能说它与农业无关。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黄渭金先生除对石镞,还对河姆渡出土的石斧、石凿、砺石、石杵、石钻、石纺轮、石弹丸、石球及石(玉)质璜、管、珠等做了分析。

河姆渡遗址只发掘出三座建筑,所以目前我们还不可能对河姆渡人的聚落形态做出确切的描述。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赵晓波副馆长根据已发现的建筑遗址承重桩的布局,认为河姆渡干栏式建筑的内部应分隔成中间大,两侧小的若干房间,她认为大房间是氏族公共场所,小房间为生活用房。这样的设想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建筑结构和分布来分析史前河姆渡人的聚落形态,恐怕还有待于河姆渡聚落遗址的大面积揭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汝祚先生在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他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构件柱头榫、柱脚榫、转角榫、梁头榫、燕尾榫、企口板的制作难度都很大,要有一定的数学知识。遗址出土的陶灶上有三个支丁,一根绳子由三根植物纤维搓成,由此推测河姆渡人已有“三”的概念。他综合了河姆渡遗址各方面的材料,认为河姆渡人已经有了 20 以内的数的概念。

有好几位学者对河姆渡人的艺术和原始崇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周玮先生把河姆渡人的艺术分为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前者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表明河姆渡人已经掌握了五声音阶的知识,而后者则偏重于写实的自然主义风格。李彤先生的论文探讨了河姆渡艺术形成的原因及其特色,他认为陶器上的绳文是制作过程中留下的痕迹,不能将一切人工痕迹都视为纹饰。一、二文化层陶器多素面少纹饰是实用心理与审美心理逐步分化的结果,指出抽象纹饰也具有原生性,纹饰的产生是二元论而非一元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楚平先生认为河姆渡器物纹饰中的太阳神形象是双鸟与太阳同体,双鸟同负太阳运行,与良渚文化纹饰中单鸟与太阳同体不一

样,与仰韶文化中鸟与太阳异体也不一样。唐德中、徐翔两位先生则认为河姆渡文化的连体双鸟图腾是河姆渡人感悟“双鸟创世”与祈求时和年丰的佐证,体现了中华和合文化的原始雏形。最叫人意想不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的论文,邓聪先生指出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两个被称为工字形陶纺轮的器物(T14④:1和77YMT242(4A):147)不是纺轮,而是耳部装饰物——耳栓。邓先生放映了世界各地许多民族的耳栓和耳饰的幻灯片,与河姆渡的这两件器物进行比较,来证明他的论点,使人大开眼界。

有的学者对河姆渡文化做了综合性的论述,如陈依元、徐定宝两位先生从河姆渡农耕文化、干栏式建筑、制陶、纺织、原始艺术等方面论述了河姆渡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余姚市文化馆的陈忠来先生把河姆渡文化的本质内涵归结为创新精神。厦门大学吴绵吉教授专门论述了河姆渡文化发现的意义,他指出这一发现对传统的江南落后论、中原中心论等片面认识是极大的冲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前文化研究,引发了许多重大课题的探索,如稻作农业的起源、木结构建筑技术的发展、大陆与海洋文化的交流、中国史前文化的区系类型及多元一体结构的思想理论等等。

这次研讨会中的第二类论题,是河姆渡文化与其他史前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这样的研究,拓宽了学术视野,对河姆渡文化与其他史前文化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军教授回顾桐乡罗家角遗址和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把钱塘江南北两处史前遗址文化内涵的异同做了对比,认为河姆渡人和马家浜人可能出自同一祖源同一血统,使用同一陶器群,后来分化出河姆渡和马家浜两支原始文化。余姚市文管会叶树望研究员将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进行对比分析,结合古史传说,推断河姆渡文化的创造者属于古东夷族。张维慎先生将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做了比较,指出河姆渡人和半坡人都居于河流或湖泊附近,只是由于气候的差异,河姆渡人

发展了稻作农业而半坡人的农业则是以粟等植物为主的旱作农业。又因地理环境之不同,半坡人采用了半穴居式的建筑,而河姆渡人则采用了高出地面的木构干栏式建筑。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石兴邦教授通过对河姆渡文化与仰韶文化同位异向发展的人文生态学考察,谈了河姆渡文化系统的百越先民面向海洋的开拓,指出河姆渡文化发展的中期向周围扩展。一支是向北、向西以长江三角洲为基地的稻作农业文化——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体系;另一支向南发展为海洋倾向的生业和聚落形态,与东南诸民族部落形成庞大的前百越族群,向海洋发展。马家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以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相联系的文化融合圈。南部面向海洋的部落,以沿海聚落为基地,逐步向太平洋诸岛屿发展,形成南岛系族群。历史上有四次较大的迁徙群。海洋族群和百越族群有着相同和相似的文化模式。河姆渡文化向海洋和向西南发展对开拓太平洋海域和西南地区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许多学者就东南沿海与台湾考古文化的关系以及百越文化和海洋文化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黄士强先生指出台湾大坌坑文化、芝山岩文化、圆山文化、营埔文化、大湖文化等等,无一不与东南沿海地区有着密切关系。其后在台湾北部和中部普遍发现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也是受大陆沿海几何印纹陶文化的影响造成的。这一现象不应是单纯的文化传播,而是多次移民造成的。

浙江大学陈桥驿教授指出,河姆渡文化其实就是宁绍地区的史前文化。这个遗址所反映的文化是从假轮虫海退以来发展到高峰的典型越文化。此后,“内越”和“外越”的文化,都是以这种文化为基础的。他通过地名学的研究,揭示外越人曾到达北起日本,南至越南的广大地区。宁波的杨成鉴先生赞同陈桥驿先生的观点,并根据《越绝书》的有关记载做了说明。王海明先生指出:四明山地至今没有发现河姆渡人退回山地的遗址及证据,考古资料显示台湾、澎湖列岛的史前文化与河姆渡文化之间还存在着某些文化缺环。

宁波大学管敏义教授认为东南沿海地区及岛屿上河姆渡、马家浜、富国墩、大盆坑、昙石山、西樵山等史前文化及进入文明时代的百越文化具有海洋文化的特色。他就海洋采集、渔猎、海洋资源的利用、发明舟楫、航海、“饭稻羹鱼”的饮食文化、断发文身、雕题黑齿的风俗、富有冒险和开拓精神等方面进行论述,并对“海洋文化”这一概念做了阐释,引起与会者很大的兴趣,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人认为河姆渡人以农耕为主,过定居生活,没有海洋文化的特征。台湾中研院陈仲玉教授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赞同管敏义的观点,认为河姆渡等地先民亲近海岸、亲近海洋,活动在沿海或海岛,利用舟楫在水上航行;生产工具石镞多于石斧;聚落模式也不同于内陆,是依山面水,在高潮线之上建造干栏式木屋。他指出海洋民族也要从事农耕,过定居生活,不能因此否定河姆渡文化有海洋文化特征。他还介绍了近年在金门岛发现的金龟山、浦边具有海洋文化特征的贝丘遗址。虞浩旭先生分析了河姆渡原始海洋渔业,认为它是我国海洋经济的曙光。北京大学教授陈炎先生说:“河姆渡是中华民族海洋文化发源地之一,它是百越文化的母系,其传播范围很广,不仅与其他系统的新石器文化共同起着互相传播交融的主导作用,推动和参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还向环太平洋区域传播。”季学源先生指出河姆渡先民海洋文化引发了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石兴邦先生分析了河姆渡文化的发展与百越先民在海洋拓殖中的事迹及其贡献,指出百越先民移植开发台湾的重大意义。他介绍了河宕文化史迹与泰雅族的埋葬习俗,并通过《左传》所记郟子少皞氏以鸟名官和赛夏族图腾制度与组织特点的比较论述,提示了百越先民与台湾原住民的深层的历史联系。台湾省博物馆阮昌锐先生说现在居于台湾山区的泰雅族、布农族等是距今 6500 年到 4500 年间自大陆迁入的,可能与绳纹陶和龙山形成期有关。居住在平地的阿美族、卑南族和葛玛兰族迁入较晚,其文化接近南岛系,南岛系的祖居地在华南地区。陈仲玉先生说高山族与福建的古闽越同

俗。他认为活动在中国沿海一带在史前时代善于海上航行的居民就是南岛语族中生活在海洋环境善于航海的族群,他们自公元前 3000 年开始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各地扩展,经过 4000 余年,至今分散在广大地区,人口已达 2.7 亿多。台湾大学韩复智教授说,从史前时代起,浙闽沿海的居民与台湾西海岸的居民便一直不断往来,大陆南方越族和台湾山地同胞均崇奉蛇图腾,行文身习俗。高山族同胞的祖先是从大陆渡海而来。台湾中兴大学黄大受教授也认为台湾的先住民是闽浙迁徙过去的古越人后裔。黄大受先生还指出,河姆渡等遗址的发现说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四面开花的,而且早在 1 万年前已经启动。

与会学者认为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刘军先生对今后河姆渡文化研究提出了几点希望:一、开展聚落形态研究;二、努力寻找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三、加强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多学科研究。陈桥驿先生等建议引进遥感等高科技研究河姆渡文化,进一步组织历史、考古、农业、畜牧、建筑、纺织、艺术、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学科专家来进行共同研究。

由于出版经费的筹集颇费时日,同时有的学者修改自己的论文也花了一些时间,所以这本论文到今天才付印。宁波大学的管敏义先生几次提出要我写序,我感到这次学术研讨会内容十分丰富,这篇序很不好写。最后只得把这次会议的总结做了一些修改,权充为“序”,虽然署了我的名字,但内容大多是管先生和宁波大学几位同志写的,实在很抱歉。

最后,要感谢浙江省海峡两岸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省台办、宁波市台办、宁波大学、余姚市政府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支持,这次研讨会,就是由浙江省海峡两岸经济促进会、省台办和宁波大学发起并由上述单位联合举办的。同时,也要感谢来自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学者,希望将来我们还能有机会欢聚在一起研讨我们大家都关心的学术问题。

序 二

杨建新

当我们着手准备海峡两岸河姆渡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就已将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列入了工作计划。尽管由于诸多原因,使得论文集的出版一再耽搁,但我们的计划一直未变。因此,当诸事俱备,终于要将论文集付梓印刷的时候,我和同事们的欣慰和愉悦是不言而喻的。

1973年6月,在中国大陆浙江省余姚市的河姆渡镇,一个极为重大的考古发现震动了学术界,这就是今天显现在人们面前的河姆渡遗址。这是一个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达4米左右,叠压着4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为距今约7000年的规模庞大的文化遗址。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领导下,考古工作者先后于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和1977年10月至1978年1月在2800平方米的面积上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挖掘,出土文物多达7000余件,为研究我国远古时期的农业、畜牧、建筑、纺织、艺术和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现有的资料和研究证明,河姆渡遗址是我国东南沿海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特征具有浓郁的南方水乡地域特色,在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学术界命名为“河姆渡文化”。作为中国南方史前文化的代表,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有力地证明了长江、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这在中外考古学、历史学研究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1982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在祖国大陆引起轰动,河姆渡文化的研究随之而展开。在河姆渡遗址发现20周年后,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考

古学会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4年在余姚市召开了首次河姆渡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展示了祖国大陆学者多年来的科研成果,共有24篇论文收入了四年后出版的论文集。与此同时,河姆渡文化也受到海峡对岸的台湾学者的关注,岛内考古界、史学界的一批知名学者对河姆渡文化同样进行了极有意义的研究,时有重要的研究发现和成果公之于世。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血脉相连,都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为了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璀璨的文化,促进海峡两岸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骨肉情谊,检阅两岸学者关于河姆渡文化的研究成果,浙江省海峡两岸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宁波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余姚市人民政府和宁波大学决定联合举办“河姆渡文化学术研讨会”。为了周到细致地安排好会务并尽可能广泛地邀请两岸学者,这次会议从酝酿到开幕,费时一年有余,于1999年10月15日在宁波市隆重召开。海峡两岸共有54位学者应邀莅会。其中台湾学者14人,来自台湾的5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大陆学者37人,来自北京、浙江、江苏、福建、陕西、广东、上海等7省市的18所大学和21个科研机构;另有3位香港学者也莅会参加了研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宁波市政府的领导亲临大会致贺,数十家媒体闻讯而来,可谓盛况空前。在会议工作人员和两岸三地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研讨会历时3天,终于圆满地落下帷幕。

不能不提的是,会议召开之际,正是台湾遭受百年罕见的9.21大地震之后,剧烈的震灾造成台湾同胞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我们在海峡这边时刻牵挂着台湾同胞的生命安危,同时也担心会议能否如期召开。然而,台湾的专家学者冒着连续不断的余震,毅然搭机飞赴大陆。当我们在宁波机场迎候诸位台湾朋友抵达时,不能不深深感受到中华文化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同时也为台湾学者对祖国历史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执著追求的精神所感动。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43篇,其数量之多,研究领域之广泛,研

究内容之深入,较之 1994 年的研讨会均有相当的进步,体现了两岸学术界对河姆渡文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水准。研讨会上,两岸学者聚首一堂,畅叙已见,相互切磋,求同存异,不仅对河姆渡文化遗存进行了多方面的、极富价值的研讨,更对河姆渡文化对中华文明以至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予了深入地研究和高度的评价。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两岸不少学者都对河姆渡文化与台湾史前文化的关系、河姆渡古越人与台湾先住民的关系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究。足可证明,两岸文化同源同宗,两岸同胞同根同种。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收入了这本论文集。惭愧的是作为门外汉的我,无法对本次研讨会取得的成果进行专业的分析和评估,只有请读者诸君仔细阅读两岸学者的美文华章了。

末了,我想说明的是,我和本次研讨会的组织委员会的同事们只是对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做了一些行政事务工作。以全国人大常委、浙江省考古学会会长毛昭晰教授为主任的学术委员会,为本次研讨会所做出的贡献是众所皆知的,没有他们的努力,本次研讨会的成功是不能想像的。至于宁波大学的校领导和相关的教职员工,也是我们必须致谢的,他们承担了大量具体的会务工作,并为编辑这本论文集付出了辛劳。

对宁波市政府和余姚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心,在此也一并致谢。

遵从论文集编辑者的要求,拉拉杂杂地写了以上文字,充其量只是一些背景介绍和说明。即便为此,已有班门弄斧之嫌。如果定要叫“序”,也只能姑妄称之,滥竽充数了。实在惶恐得很。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我们期盼着下一次海峡两岸河姆渡文化研讨会的召开。

2000 年 11 月 28 日于北京

目 录

序一	毛昭晰(1)
序二	杨建新(8)
河姆渡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刘 军(1)
再论河姆渡文化的溯源和追流问题	石兴邦(17)
河姆渡遗址与河姆渡文化(摘要)	王海明(43)
河姆渡文化早期姚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张之恒(47)
水环境压力和河姆渡文化迁徙的研究(摘要)	
..... 邵九华、邵尧明、夏梦河	(54)
略论地理环境在河姆渡文化兴衰中的作用	李小红(55)
河姆渡遗址在越文化研究中的意义	陈桥驿(65)
河姆渡遗址石器初探	黄渭金(72)
论河姆渡文化中的石铈	林士民(84)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灶	毛昭晰(95)
河姆渡人的族源和稻作的传播问题(提要)	游修龄(98)
河姆渡文化植物遗存的研究(摘要)	俞为洁、徐耀良(99)
神农氏传说的农业(提要)	王仲孚(100)
河姆渡人所创造的饮食文化	曾 骐(101)
河姆渡遗址干栏式建筑的再认识	赵晓波(106)
河姆渡文化艺术的美学新解	周 玮(116)
关于河姆渡原始艺术研究的思考(摘要)	李 彤(124)
河姆渡文化与原始审美意识的产生	俞建伟(125)
从河姆渡的陶质耳栓说起	邓 聪(134)
华夏和合文化的原始雏形——河姆渡先民连体双鸟图腾新释	

.....	唐德中、徐翔(146)
东西方太阳神形象比较研究.....	董楚平(153)
初探河姆渡文化人们的数理知识.....	吴汝祚(160)
“河姆渡人”及其后裔的敬犬习俗.....	徐建春(171)
河姆渡文化创造者的族属探讨.....	叶树望(175)
河姆渡文化与半坡文化比较研究(摘要).....	张维慎(186)
河姆渡文化——百越文化与海洋文化.....	管敏义(187)
中华江海文化发源地——河姆渡文化遗址.....	杨成鉴(201)
我国海洋经济的曙光——论河姆渡原始海洋渔业及其意义	虞浩旭(208)
试论中国东南沿海史前的海洋族群.....	陈仲玉(214)
浙闽沿海地区与台湾史前人类文化的关系(提要).....	韩复智(224)
台湾泰雅文化的特色(提要).....	阮昌锐(226)
河姆渡文化发现的意义(提要).....	吴绵吉(227)
河姆渡文化对研究环太平洋区域文明的起源与传播的 重大意义.....	陈炎(228)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产生的重大 影响(提要).....	史式、赵晓波(237)
河姆渡文化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	黄大受(239)
试论河姆渡文化的本质内涵(提要).....	陈忠来(244)
河姆渡文化——华夏民族文化的雏形.....	徐定宝(245)
河姆渡考古与中华民族文化源(提要).....	何鸿(251)
先秦时期以河姆渡为中心的浙东原始文化的演变.....	钱茂伟(252)
河姆渡文化·长江文化·中华文化.....	季学原(255)
河姆渡文化与越国经济发展.....	乐承耀(264)
河姆渡在中华乃至人类经济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	陈依元(271)
文化与文明的差异——河姆渡文化研究中一个应该区分的 问题.....	王慕民(280)
后记.....	编者(284)

河姆渡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刘 军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河姆渡文化因河姆渡遗址而得名。河姆渡遗址位于东经121°22′、北纬 29°58′。东距宁波市 25 千米,西距余姚市 24 千米。具体坐落在现今的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东南侧。

河姆渡文化的确立

河姆渡遗址是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时机重见天日的。1973 年夏,原罗江公社东方红大队和红心大队干部、群众在公社党委领导下,紧靠姚江北边实施翻水站工程建设。为了安装大型水泵,挖掘水闸基坑时,发现距地表 3 米多的地层中,夹有许多被当时社员称为石头、瓦片及骨头一类的“东西”,引起了公社副主任罗春华同志的重视。当省博物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看到这些“东西”时都为此感到十分高兴,觉得这一发现非常重要,非同一般。马上组织在杭的专业人员到出土“东西”的现场进行试掘,结果发现遗址堆积厚,具有上、下两大文化层,是个文化内涵丰富、保存情况相当好的史前遗址。经馆领导研究,由省文化局请示国家文物局批准,同年 11 月 4 日开始对河姆渡遗址进行正式发掘,至次年 1 月 10 日结束,布 5×5 探方 34 个,共发掘 850 平方米,实际发掘面积 630 平方米。

经过两个多月的野外考古发掘,弄清了该遗址自上而下有四个

相互叠压的文化层,厚达4米左右。第一、二文化层所出土的包含物是我省在浙北平原上发现过的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内涵。第三、四层出土的以夹炭黑陶制作的肩脊敛口釜和敞口釜、双耳罐、深腹盆、浅腹盘、单耳钵、筒腹尊形器、方柱形釜支架,是一批前所未见的新“东西”,并且,在全国其他同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中也未曾见过。带着这些出土遗物,我们上了北京,请教同行专家和学者,有些专家看过后觉得特别新鲜,认为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内涵,但也有个别专家看过后觉得这些文物还是比较迟的“东西”。北京之行并未有个明确的结论。1976年4月5日至12日,由浙江省文化局出面,发函邀请国家文物局及全国有关专家学者30多人聚会杭州,参加“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与会代表听取了第一期发掘成果介绍,观看了出土遗物,并到河姆渡遗址实地考察试掘坑的地层,认为地层划分正确。会上许多代表一致同意河姆渡遗址第三、四文化层可命名为“河姆渡文化”,之后得到全国考古界同行的认可。河姆渡遗址的第三、四文化层的年代,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 ^{14}C 测定,大约在6000~7000年之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河姆渡文化的确立,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史上的突破性成果之一,它使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考古编年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段,为研究我国原始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江南文化发展一向较晚的传统观念被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所纠正,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哺育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母亲河,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为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轰动了国内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从此“河姆渡文化”被载入史册,编选进大学和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世人刮目相看。

河姆渡遗址的首期发掘工作,实际只发掘了630平方米,仅占遗址总面积的六十分之一还不到。制石、制陶作坊、公共墓地尚未找到,房屋结构及其布局也还不清楚,这对于进一步探讨当时的社会组织、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面貌等问题,还缺乏足够资料以资分析,聚